

豐子愷傳

(二)

(本文插圖刊第2、52、53頁)

——夏師益友薰陶

●豐一吟·豐陳寶等著

寄宿師範琢磨成器 絕對服從的好學生

一九一四年暑假過後，豐仁(子愷)登上了旅途。第一次離開慈母膝下，不免依依難捨；告別了一向稔熟的父老鄉親，初次來到杭州，還不知等待着自已的未來的學校寄宿生活是個什麼樣兒呢。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位於杭州貢院舊址，它的前身是浙江兩級師範學校。全校共有學生四百五十人，分十個班。這一年招收的預科新生八十餘人，分為甲乙兩班。豐仁被編在甲班。

這裏的生活和家裏截然不同，「猶如把數百只小猴關閉在一個大籠子中」。除了擠在一堂上課之外，自修室裏也只有每人半只書桌，一只板椅子的坐位。在談笑聲和琅琅的讀書聲中，必須把自己訓練得置若罔聞，才能做得進功課。白天是不准進寢室的，只有到了晚上九點半，寢室的總門才打開，學生像羊羣一般被驅逐進去後，必須立刻鑽進眠床，十點鐘一到就熄燈。這對於青年時代不易立刻入睡的豐仁說來，是一件苦惱的事。次日早晨六七點鐘，寢室總長就在長廊中吹警

笛，把所有的學生從眠床中吹出，立刻鎖閉總門。一日三餐，七八個毛頭小伙子圍着一張板桌，老虎吃蝴蝶——之勢。同學們大都眼明手快，當食不讓。豐仁却不但羞澀腴腆，而且拙於筷技，有時實在夾不到菜，只蘸了一些湯也就送下了白飯。幸而自幼受父親影響，不喜吃肉，可以不必參與爭肉的進攻戰。

上體操課時，豐仁尤其感到苦惱。體操先生把學生當作兵來訓練。背負着很重的毛瑟槍練習跪擊，對豐仁來說是最痛苦的姿勢。因為他的腿構造異常，臀部不能坐在腳踵上，跪擊時比別人高出一段，便要被那教師用腿頂住背部，兩手在他肩上用力硬按，使得豐仁痛不可當，連槍帶人倒在地。

只有生了病住進調養室去，那裏才是自由的天地。桌椅床舖的位置可以自由移動，起居可以隨意早晚，上課可以堂皇地缺席，還可以叫廚子做些愛吃的小菜。但對於進入調養室，舍監和校醫是嚴格地限制的。豐仁曾托瘴疾的福進去過幾天，不幸而立刻痊癒，又得關進籠子裏去過猴子

般的生活了。

在這樣死板而嚴格的管束下，再加上人地生疏，舉目無親，豐仁感到寄宿舍生活實在可怕而可悲。然而他不敢反抗。這個性喜活躍的寵兒，一時不得不變成了一個「絕對服從的好學生」，又好比成了「一架隨人運轉的有功的機器」。

摯友長逝悼念深切

就在這個時候，他認識了同學楊伯豪。楊伯豪與豐仁同在甲班。當時自修室的學生是高低年級混合編排的。在「先進山門」的老學生們縱情談笑的環境中，豐仁發現還有一個人也和他一樣枯坐着，顯然也是新生，便開始和他攀談。這人就是楊伯豪，名家備，浙江餘姚人，年齡比豐仁略長。他有一個深刻冷靜的頭腦，又有卓絕不凡的志向。兩個初相識的學友偏偏不在同一宿舍，不能聯榻談話，於是只得冒着被舍監斥責的危險，進寢室後在外面的長廊中憑窗佇立，互相談心，最後往往在暗中摸索着去就寢。伯豪責備豐仁唯母命和師訓是從，來進師範，而沒有自己的宗旨和志向。這話給豐仁以很大的刺激，促成了他

的自悟。伯豪蔑視不合理的宿舍規則，常常把集體進出寢室稱之為「放犯人」。這對於當時視宿舍規則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豐仁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事。就在豐仁患瘧疾的那回，起初只是聽任身上發冷，哪裏敢提出要回寢室取衣服。幸虧伯豪代他去請寢室總長開了門，取出衣服被褥，送進調養室去休息。

伯豪不喜歡聽某先生的課時，便獨自到自修室裏去看《史記》、《漢書》等，寧可受到留級、開除的威脅。他和豐仁同遊西湖，常常喜歡到人迹稀少的無名的地方。總之，這是一個個性特強而有獨特見解的青年。盡管他在學時間不長，不久就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退學，回餘姚去當了小學教師，但他的性格已經給豐仁留下不可磨滅的影響。一種對於世間的反感，對於人類的嫌惡，和對於生活的厭倦，在豐仁心中日漸積集起來了。同時，蔑視種種形式主義的清規戒律，發揮自己的獨創見解，也漸漸地成了少年豐仁的固有的素質。

豐仁在浙一師的最後一個學期，就奉母命於花朝日（農曆二月十二日）與徐力民結婚。那時，伯豪已經退學回餘姚，但他做了幾首祝賀詩寄來，其中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圓月半天。鸚鵡三日後，渾不羨神仙。」

豐仁在浙一師畢業後為謀生之便來到餘姚時，也曾去小學校裏訪問過楊伯豪，當時兩人都為了家庭負擔而奔走求生，少年時代的回憶已經成為夢幻。

一九二九年楊伯豪因病與世長辭。好友沈澤

民（沈雁冰的弟弟）去餘姚辦理他的追悼會。豐仁則心緒紊亂，無法寫輓聯托他帶去，過後專門寫了《伯豪之死》一文，以表示對這位少年時代的摯友的深切悼念之情。

豐仁在浙一師攻讀期間，每年寒暑假回鄉時，總要到當地的振華女校去義務教學。振華女校是豐仁的大姐豐瀛於一九一三年創辦的，三姐豐滿曾任該校第二任校長。（豐仁結婚後，妻子徐力民也曾任該校任教。）豐仁到這裏為該校學生和當地羣衆上音樂、圖畫課，並組織音樂會、遊藝會等文藝活動，搞得生氣勃勃，頗受大家歡迎。這可以說是豐子愷最早的藝術教學實踐活動。

勤苦學習改名子愷

浙一師對豐仁來說，寄宿生活的嚴格枯燥只是其一個方面而已（也是由於起初不習慣的緣故），在學業上，這所省城師範畢竟不同一般。這五年的學習，對豐仁的前途竟可說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校長經亨頤（子淵）是一個有名的教育家。從兩級師範到浙一師，教師中多傑出的人材。早期有沈鈞儒、張宗祥、沈尹默、周樹人（魯迅）、馬敘倫等；豐仁在學時期有李叔同、夏丐尊、單不廣、堵申甫、姜丹書、王更三等；豐仁畢業以後，又有陳望道、劉大白、朱自清、俞平伯、葉聖陶等，先後在浙一師任過教職。從這份陣容堅強的名單中，可以看出這所師範學校確實非同一般。

豐仁自幼就有鏗而不捨的學習精神，再加上

慈母的教訓時刻記在心頭，在浙一師求學期間分秒必爭地勤學苦研，所以開頭一二年門功課都成績優異。學期考試屢獲第一名，加之他又是一個規矩矩的學生，所以經亨頤校長曾在全校大會中宣布他為模範生。

國文老師單不廣也很喜歡豐仁，根據他這個單名，給他取了一個號，叫做子凱。凱與愷通，後來就一直用豐子愷這個名字了。

生活道路的轉捩點 接受李叔同的薰陶

豐子愷在浙一師求學的這段時期，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的轉折點。正是在這裏，他受到了中國近代文藝先驅者李叔同先生的藝術薰陶，從此就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

李先生給這個學生最初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在上音樂課的時候。在一般學校裏，音樂往往被視為可有可無的娛樂性課業，哇哩哇拉地叫嚷一通，一節課就過去了。在浙一師上第一堂音樂課時，同學們正是懷着這樣的心情嘻嘻哈哈地走進音樂教室去的。可是一走進門，都楞住了。音樂教師已經端坐在講台上，但見他那高高的瘦削的半身穿着整潔的黑布馬褂，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梁，作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溝，顯示和愛的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個字來描寫，大概差不多了。這位就是李叔同先生。

李叔同，原籍浙江平湖，一八八〇年出生於

天津的富裕之家，他在音樂、戲劇、美術、文學、書法、金石等各方面都富有天才。年輕時就已在上海的文壇上嶄露頭角，應徵文章總是名列第一。後來赴日本游學，入東京上野美術專門學校西洋畫科，一方面研究鋼琴音樂和作曲，同時又與曾孝谷、歐陽予倩等人在東京創辦「春柳劇社」——中國第一個話劇社，親自扮演茶花女等角色。回國後，先後在天津工藝專門學堂、上海城東女校任教，以後又在太平洋報社擔任文藝編輯，并與柳亞子先生等創辦「文美會」，主編《文美》雜誌。是他第一個把話劇、油畫和鋼琴音樂介紹到中國來。中國第一個畫油畫的也是他。當他在浙一師任教圖畫音樂時，同時也兼任南京高等師範的圖畫音樂課，給這兩校造就了不少藝術人才。如吳夢非、劉質平、潘天壽等都是他在浙一師的學生。

大約由於有李叔同任教的關係，這個師範學校對圖畫音樂課特別注重。當時校內有數十架風琴，還有鋼琴。李先生上一小時課，預備的時間恐怕要半天。除了教課程內的音樂之外，他又在課餘指導學生彈琴。他作了示範演奏後，便要學生練習得很純熟，還彈給他聽。「選琴」的時間只能安排在三餐飯前後的休息時間內，這就使豐子愷不得不養成了吃快飯的習慣。「選琴」的要求十分嚴格，即使是指法上的錯誤，也會引起李先生對他嚴肅地一瞥，表示通不過，於是只得下次再選。浙一師的音樂氣氛是很濃烈的，課餘時間時時可以聽到琴聲。

圖畫課也是一樣。初年級的圖畫課是採用範

本（商務版的《鉛筆畫臨本》），教學生依樣畫葫蘆地臨畫。這對當時的豐子愷來說，比起他在家鄉印描或者打格子放大的畫法來，是進了一步。但從二年級起，圖畫改由李叔同教。由於李先生對圖畫十分重視的關係，校內設備完善，有兩個圖畫專用的教室，許多石膏模型像。李先生教學生用木炭作石膏模型寫生。練習的時間也都放在課餘。豐子愷這時方才明白，以前那些範本原來是別人看了實物畫出來的。從此他就停止臨摹，努力練習寫生，進步很快。有一天晚上，他為了級長的公事到李先生房中去報告（李先生當時是他們的級任老師），報告完畢將要退出時，李先生喊他轉來，溫和而嚴肅地對他說：「你的圖畫進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兩校教課，沒見過像你這樣進步快速的人。」接着便向這位高材生提出了關於他的發展前途的建議。豐子愷接受了老師的指點，從此打定主意，潛心研究繪畫，把一生貢獻給藝術。

專心攻畫忘卻環境

豐子愷一心專攻圖畫音樂，其他各課的學習成績就逐漸下降，有時竟考末名。最後畢業於浙一師時，總平均分數是第二十名。然而他對於成績下降并不介意，還是繼續研習他所喜愛的課業。浙一師有課餘組織的「桐陰畫會」（後改名為「洋畫研究會」）和「樂石社」（金石篆刻組織，後改名為「寄社」），他也積極參加。此外，晚上他還請李叔同先生教日文。自己從學校的圖書館、藏書樓中借來英文的《人體畫》和日文的

《正則洋畫講義》等書，潛心閱讀，深入研究繪畫理論。有一個時期，豐子愷熱中於觀察一個人頭部五官的比例。後來他回到家鄉，甚至把母親的臉當作石膏模型來看，用心研究她的形態結構，覺得她的相貌像德國音樂家瓦格納，他出神得連母親問他話也聽不見了。在杭州時，也鬧過笑話。那時他常常托事請假到西湖上去寫生。有一次，看到一個同坐西湖船的老人家眼睛生得特別高，他便從袋裏抽出一枝鉛筆來，豎起了向老人的面前伸過去，打算測量其比例，老人以為他拾到了鉛筆還給自己，笑着伸手來接，然後又說：「這不是我的東西，嘿嘿！」還有一次，豐子愷在站台上等火車，站台立刻成了他的圖畫教室。他看見一個賣花生米的人，眼睛細得大尋得着。他想看清楚究竟生得高低如何，便走過去。那人立刻笑嘻嘻地問要買多少花生米，他只得將錯就錯，買下一包。從這些笑話中可以看出，豐子愷研究一門學問，甚至會專心到忘却周圍的環境。這種認真的學風與李先生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李叔同除了凡事認真之外，還有一個特點便是多才多藝。「他的語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李叔同之所以在校中受到全體師生員工普遍尊敬，更重要的是他的品德高尚，這從他的文藝觀中便可看出。他贊同唐朝裴行儉的「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一說，常常誠告別人：「文藝應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李叔同又是一個愛國者。豐子愷在小學時就唱過他所作的《祖國歌》。浙一師時，愛國運動和勸用國貨的宣傳

依舊盛行。教務長王更三現身說法，到處宣講愛國的道理。李叔同則默默無言地身體力行，他脫下洋裝，穿上一身布衣，甚至連外國貨寬緊帶也不用。因此，借夏丏尊先生的話來講：「他做教師，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薩的有「後光」。所以他從不威脅學生，而學生見他自生畏敬，……他是實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說自有學校以來，自有教師以來，未有盛於李先生者也。」但正是這位李叔同先生，在走遍了藝術的各個領域之後，漸漸產生了脫離塵俗的念頭，不再熱心參與世事。豐子愷的日文他也不教下去了，改請夏丏尊先生來教。他在日本的師友，畫家黑田清輝、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來寫生時，也都委托豐子愷去陪同。自己關起門來研究道學，到大慈山去斷食。但學道的時間不長，後來終於改為學佛。一九一八年，他在即將入山修行時，穿上和尚衣服與平日最親近的兩個學生劉質平、豐子愷合拍了一張照片留作紀念，然後到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為僧了。從此，李叔同便成了弘一法師。

李叔同出家時，還只有三十九歲。對於他出家的原因，豐子愷曾在後來的文章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豐子愷在為廈門佛學會所作的演講《我與弘一法師》中說：「我以爲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三層樓。懶得（或無力）走樓梯的，就住在第一層，即把物質生活弄得很好

，……這樣就滿足了。這也是一種人生觀。抱這樣的人生觀的人，在世間占大多數。其次，高興（或有力）走樓梯的，就爬上二層樓去玩，或者久居在裏頭。這就是專心學術文藝的人。他們把全力貢獻於學問的研究，把全心寄托於文藝的創作和欣賞。這樣的人，在世間也很多，即所謂「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還有一種人「人生欲」很強，腳力很大，對二層樓還不足，就再走樓梯，爬上三層樓去。這就是宗教徒了。……他們以爲財產子孫都是身外之物，學術文藝都是暫時的美景，連自己的身體也都是虛幻的存在。……我們的弘一法師，是一層一層的走上去的。但在解放後的一九五七年，豐子愷由於自己的世界觀有了轉變，對這位老師的出家又有了新的看法。他在《李叔同先生的文藝觀》一文中引用了李叔同為慶祝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而填寫的一曲《滿江紅》：「……看從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接着說：「李先生這樣熱烈地慶喜河山的光復，後來怎麼捨得拋棄這一担好河山，而遁入空門呢？我想，這也彷彿是屈原爲了楚王無道而愛國自沉吧！假定李先生在「靈山勝會」上和屈原相見，我想一定拈花相視而笑。」進而把李叔同的出家，和社會原因聯繫起來了。

兩位導師寶貴教誨

李叔同出家前，把圖書音樂的書籍用品全部送了人。豐子愷受得了不少。他特地從故鄉雇了一條船到杭州，把這些東西載回老家去珍藏。鄉親們以爲他一定是載了一船寶貝回來了，一看，

却全是些他們認爲一錢不值的東西，當時傳爲笑談。其實這些東西對豐子愷來說却是比什麼都珍貴的紀念品。

隨同這些紀念品，豐子愷也接受了弘一法師的佛教思想影響，一直到他逝世，這種影響長期地支配着他的世界觀。不過所表現的形式與其先師不同。他後來雖然曾皈依弘一法師，信奉宗教哲學，但他的實踐遠遠地超過了他的信仰。他的一生，主要是秉承老師「認真」的作風，對世事採取積極的態度。這一點，可以從他後來的生活道路（尤其是抗戰開始後）得到證實。

浙一師還有一位引人注目的老師，即夏丏尊先生。

李叔同在浙一師的教育態度是溫而厲，他從來不罵人。學生犯了過失，他當時不說，過後特地叫這學生到房間裏，和顏悅色，低聲下氣的開導他。夏丏尊對學生的態度則和他完全不同。夏先生起初當舍監。他遇到看不順眼的事，就大聲地呵斥學生，管束他們的一切行爲。然而完全是善意的管束。假日學生出門，他要在後面大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銅鈔少用些！」學生們看見他的頭大而圓，給他起一個渾名叫「夏木瓜」，但這是一個愛稱。學生們有什麼要請願，便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有一個頑皮學生甚至說：「我寧願夏木瓜罵一頓，李先生開導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來。」

「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在浙一師時

曾給豐子愷以「同樣寶貴的教誨」。

夏先生後來教國文了。他也是一個博學多能的全才。他所稱頌李先生的「有後光」的話，其實也適用於他自己。那時洶湧澎湃的五四運動即將到來，浙一師是江南新文化的重點學校。夏可尊便是積極提倡新文學，堅決反對封建文學的一員闖將。他要求學生做作文「不准講空話，要老實寫」。同學中有人寫自己「星夜匍匐奔喪」，夏先生就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又有一同學發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便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師範學校？」使得對方無言對答。這種大膽的革命主張，喝醒了學生們因循守舊的頭腦，自然也給豐子愷以良好的影響。豐子愷寫文章，便是在夏先生的直接指導與鼓勵之下學起來的。

夏先生在性格上是一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嘆氣。他不但愛自家，又愛友，愛校，愛店，愛國，愛世。

青年時代的這兩個導師，一個培育了豐子愷的藝術才智和認真的苦學精神，一個啟發了他的文章才華和憂國憂民的愛世之心，再加上踏上社會後的交遊所給予的種種影響——這便形成了豐子愷後來的個性發展和為學立業的道路。

豐子愷在浙一師的最後幾年，對這學校已經完全習慣，尤其喜歡校中師生的父子兄弟般的融洽關係。他結識了不少畫會會友和同窗學友如潘錫九、徐哲川、呂伯攸、田錫安、沈本千、傅彬

然、葉天瑞、黃鳴祥、李尊庸等等。畫會在他畢業那年還舉行了對外第一次畫展，弘一法師也應邀到場指導。浙一師良師益友的薰陶，為豐子愷此後的事業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初出茅廬專校教書

一九一九年，豐子愷在浙一師畢業後，十分希望繼續求學，專修國畫，但當時家境不許可這樣做。正在躊躇之際，恰好有同校高級師範國畫手工專修科畢業的吳夢非和新從日本研究音樂歸國的同學劉質平，計議在上海創辦一所培養國畫音樂手工教員的專科師範學校，拉豐子愷合作，豐子愷欣然應命。當時在上海以藝術為專科的學校還很少，吳、劉、豐三氏都是浙一師時李叔同先生的學生。吳氏攻手工，劉氏攻音樂，豐氏攻繪畫，三人合作，各自發揮自己的特長。上海專科師範學校校址就在小西門黃家闕路。吳任校長，豐任教務主任。

在籌備這所專科師範學校的同時，吳夢非、劉質平、豐子愷三人一起應邀到上海東亞體育學校任教。這是我國早期一所著名的體育專科學校。豐在該校任教圖畫，吳、劉二人則教音樂。那時豐子愷才二十一歲，是校中最年輕的一個教師，而台下的學生年紀與他相仿，有的甚至比他還大。但豐子愷的講課却很受歡迎。豐子愷還曾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該校校刊第一期上發表《圖畫教授談》一文，在第二期上發表《素描》一文，後者是從日本學者久米桂一郎所著《素描》一書中節錄的，每段譯文後面附有豐的學習心得和注

釋。這篇《素描》是迄今所能找到的豐子愷的最早一篇譯文，豐子愷在東亞體校任教一年有餘。在專科師範任教的時候，豐子愷還在愛國女學和城東女校兼課。這時豐子愷已經結婚，妻子徐力民就在城東女校專修班讀書。城東女校的校長楊白民是李叔同先生的朋友。

初出茅廬的豐子愷在專科師範等學校踏上講台時，心情不免有點緊張。因為他在浙一師（初級師範）學習了五年出來，只相當於普通中學畢業的程度。該校原是以培養小學教師為目的，況且在最初幾年，他把精力用於埋頭攻讀其他各課，對圖畫發生興趣，還是後幾年的事，所以無論在資歷上和學歷都不很成熟。尤其是上海專科師範的課業，讓一個初級師範畢業生來教，自然是很吃力的。他自己也認為這是一副「不自量力」的重担，但他畢竟大膽果敢地把它肩負起來了。而且積極地參與了社會活動。

在專科師範，豐子愷教的是西洋畫課。任教期間，竭力主張「忠實寫生」的畫法，以為繪畫以忠實模寫自然為第一要義。又向學生演說，謂「中國畫的不忠於寫實，為其最大的缺點；自然中含有無窮的美，唯能忠實於自然模寫者，方能發見其美。」并將其任浙一師時所作的木炭畫給學生看，鼓勵他們忠實寫生。後來他回憶起那時的論點和教法來，覺得自己當時對繪畫還只是一知半解，真是「閉門造車」。尤其是在閱讀了幾冊日本美術雜誌後，知道了一些西洋畫界的近況，更加感覺到自己知識的不足。有一次他在給學生布置靜物寫生標本時，「曾為了一只青皮桔

子而起自傷之念」，以為自己「猶似一只半生半熟的桔子，現在帶着青皮賣掉，給人家當作習畫標本了」。在專科師範任教一年半後，為了進一步豐富和充實自己的知識，為了想窺見西洋畫的全貌，他決心東渡日本求學。

赴日深造金盡回國

然而當時豐子愷已有妻室，并已生下長女陳寶（即阿寶），做教師所得的錢，贍養家庭還不夠，那裏有可能去留學呢？但豐子愷抱着強烈的求知欲望，向他的姐夫周印池借了四百元錢，母親鍾氏忍痛為他出國而賣去了一宅祖屋，三姐豐滿（後名夢忍）也賣去飾物相助。他帶着這筆有限的錢，於一九二一年早春赴杭州開口風生寺向弘一法師話別後，便獨自冒着風險到日本東京求學去了。幸而到了東京之後，岳父約了一個一千元約會，按期給他寄錢去，專科師範的同人吳夢非、劉質平也寄錢資助，結果總共約得二千元錢，得以在東京維持了約十個月的用度。同年冬天，金盡回國。在東京的十個月，好學不倦的豐子愷，似覺進入了一座寶山，各種學問都想學，真不知該從何下手。他在回憶這件事時說：「這時候我已覺悟了各種學問的深廣，我只有區區十個月的求學時間，決不濟事。不如走馬看花，呼吸一些東京藝術界的空氣而回國吧。」又說：「這一去稱為留學嫌太短，稱為旅行嫌太長，成了三不像的東西。」

就在這「三不像」的十個月裏，豐子愷却發揮了他那難以言喻的好學精神和異乎尋常的求學

勁道，把需要幾年才能學完的知識，經過巧妙的安排，濃縮到十個月裏學完了。在這十個月內，起初是上午到洋畫研究會去學畫，下午讀日文。後來下午停止了日文而改學小提琴（起初到某音樂研究會去學，後來跟一個姓林的日本先生學），晚上又去學英文。但是各科也常常請假，騰出時間來到處參觀遊覽。因為他認為畫管描也無益，還是聽聽看看想想好。東京、西京、橫濱等處的畫展，音樂會，歌劇場，舊書鋪中，都有他的足跡。還去工藝美術廠，甚至玩具廠參觀，因為他認為玩具有是美術、教育與工業三者密切合作的產物。他不浪費一分鐘的時間，不放過一個學習的機會，貪婪地吸收各種知識。

為了加快學習速度，他還「異想天開」地改革學習方法。例如，他嫌專為中國人教日文的學校進度太慢，便到一個英語學校去報名入初級班，每天去聽課兩小時。英語學校從 *Doyle & Tobin* 敬起，這對於豐子愷來說是太淺了，但他的目的是要聽這位日本先生怎樣用日語解說他所已經懂得的英語，以便在這時候學取日語會話的絕竅。他說：「這異想天開的辦法果然成功了。我在那英語學校裏聽了一個月講，果然於日語會話及聽講上獲得了很多的進步。同時看書的能力也進步起來……後來，為了學習英語，他又另入一所英語學校。」

除了學習日文、英文以外，他還讀過短時期的德文、俄文。在談到自己苦學的體會時，豐子愷曾說：「我對於學問相信要用機械的方法而下苦功」，「我們要獲得一種知識，可以先定一個

範圍，立一個預算，每日學習若干，則若干日可以學畢，然後每日切實地實行，非大故不准間斷，如同吃飯一樣。」關於學外語，他更是深感非加快速度不可：「學一種外國語要拖長許久的時日，我們的人生有幾回可供拖長呢？語言文字，不過是求學問的一種工具，不是學問的本身，學些工具都要拖長許久的時日，此生還來得及研究幾許學問呢？」在美術、音樂方面，豐子愷更是抓緊時間學習。他畫了十個月的木炭畫，拉完了三本 *△* 霍曼 *▽*。豐子愷拉小提琴刻苦用功，常常拉到指尖皮破肉綻。有時為熟練一首樂曲，立誓非連續拉滿五十遍方可就寢，因而妨礙了鄰室客人的安睡，受到旅舍主人的警告。

在繪畫方面，也確實增長了很多見識，窺見了西洋美術的面影，看到了日本美術界的現狀，而對竹久夢二和藤谷虹兒的畫風尤為欽慕。特別是竹久夢二，對於後來豐子愷的漫畫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回想過去所見的繪畫，給我印象最深而使我不能忘懷的，是一種小小的毛筆畫。」豐子愷描述他最初在日本舊書攤上發現夢二畫集的心情說：「我當時便在舊書攤上出神。……我不再翻看別的畫，就出數角錢買了這一冊舊書，帶回寓中去仔細閱讀。」「寥寥數筆的一幅小畫，不僅以造型的美感感動我的眼，又以詩的意味感動我的心。」在日本十個月的遊學，使他增長了不少見識，提高了各方面的素養，為未來的藝術家奠定了事業的基礎。在日本，豐子愷還結識了陳之佛、黃涵秋、關良等學友，歸國後一直同他們保持親密的友誼。（未完待續）